

福利国家转变的数量维度

——21 个 OECD 国家的宏观统计改革轨迹(1980-2001)

Stefan Kühner*

郑静东 译 陈永杰 校

【摘要】本文讨论了 21 个 OECD 国家在 1980 年到 2001 年不同的福利改革轨迹。为了说明“福利国家转变”的多维度特征,本文探讨了社会保障支出、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以及福利成果这三个领域中众多的宏观统计指标的动态,使用了总计 12 个不同的指标(每个领域 4 个),并把这些领域的分析结果整合成一个“福利国家转变”的指数。该实证研究表明,OECD 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出现大范围的福利国家消解现象这一观点颇为言过其实。不过,“福利反弹”的理论也一样不甚可靠。事实上,在该时期内一些国家确实缩减了福利支出,一些维持稳定,而另一些则明显地扩张了。有趣的是,艾斯平-安达森的福利国家分类框架并不足以解释这些截然不同的改革轨迹。

【关键词】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消解 福利反弹 OECD 国家 去商品化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库勒(Kühner,2007)指出,广泛使用的基于支出来衡量“福利国

* Stefan Kühner,英国约克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讲师;郑静东,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外事秘书;陈永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讲师。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举办的第一届中欧公共行政国际会议上作过陈述。笔者非常感谢与会代表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以及在撰写本文过程中约克大学的赫德森(Dr. John Hudson)提供的意见。他们的建议使本文的结构更为严密,论证更为充分。此外,笔者还要感谢陈永杰鼓励我向《公共行政评论》投稿,以及郑静东的仔细翻译,我才有这个机会与中国学界分享我的研究成果,特此鸣谢。

家转变”的方法在分析国家时会产生非常不连贯的结论。尽管学者们强调这些测量方法存在概念上的缺陷 (Clasen & Siegel, 2007; Green-Pedersen, 2004), 一系列常用数据源和可操作定义衍生的问题也浮现出来, 这在福利国家重组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Clasen & Siegel, 2007; Green-Pedersen, 2004)。一直有观点认为, 缺失值、不精确的可操作定义和代理指标的运用是导致上述基于支出的福利国家研究中的不对称的主要原因。

显然, 对福利国家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从来就不限于使用毛福利或净福利的统计数据。在无数的例子中, 研究者使用诸如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等福利慷慨度或成果的衡量因素作为因变量, 以补充基于支出的变量 (Huber & Stephens, 2001);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 预算变量则被忽略不计 (Birchfield & Crepaz, 1998)。近来在获取宏观社会权利数据方面的进展 (Scruggs, 2006) 使得研究者对福利国家发展轨迹的理解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

与此同时, 一些对比较福利国家发展颇具争议的讨论, 都不约而同地更为关注概念问题的论述。维斯 (Vis, 2007) 着重指出, 不同学界在比较福利国家研究方面有不同的传统, 于是就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和程度的看法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 皮尔森 (Pierson, 1996) 强调诸如“路径依赖”、“锁定效果”这些“新制度学派”概念和主要福利项目持续获得选民支持的事实, 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 即成熟的福利国家在内在和外在的变化压力中仍保持着显著的“回弹力” (resilient); 艾斯平 - 安达森 (Esping-Andersen, 1996) 则通过突显福利国家的制度特点, 认为不同的福利制度都应该或多或少有益于改变。这两种传统都回顾了以往一系列有力的研究, 似乎都言之成理。另一方面, 捷索普 (Jessop, 2002) 和密斯拉 (Mishra, 1999) 等人认为, 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类型的废止和 (与此紧密相关的) 经济体之间国际性的相互依赖是成本控制、通货紧缩和工利 (workfare) 等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简而言之, 他们认为大范围的福利消解是在财政紧缩时政府为保持经济竞争力所作的尝试。

虽然有些文献在解决上述分歧上取得了进展,但是更多新近出版的成果表明这个问题仍然处在重要辩论的中心(Castles, 2004)。近年来学术讨论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明确了单一的认识论方法不如多维度和个案研究的结合。甚至在定量分析的文献中,学者们也更多地强调“福利国家转变”这个概念多维度的重要性,换言之,单一指标的研究(我们应该加上:单一领域研究)容易产生简单化的——最糟糕的是——对成熟福利国家福利改革轨迹误导性的结论。

本文将结合比较福利国家研究中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来解决“因变量问题”(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尤其是要说明利用已有的次级数据源进行研究的边界。我们讨论的重点在于:成熟的福利国家真正改变的程度和方向是什么?如果我们将多个指标考虑进去,结论会有什么变化?本文只限于分析不同的宏观数据,这点与近年来衡量福利国家的更创新的做法相左,可能会引发批评(Kvist, 2006; Vis, 2007)。但是,“实践现实”(practical reality)这类研究将继续使用由诸如 OECD 或 ILO 的国际组织提供的宏观衡量方法。当研究者们因难以得到更详细更优质的数据而继续将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国家包括进来以提高他们的样本数量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不过,对文献中不同宏观衡量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提出质疑和讨论都是理所当然的。明确了这些局限后,我们将引入基于总计 12 个支出、社会权利和成果指标的“福利国家转变指数”。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将介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和社会分层的动态指标。接下来,我们至少会提供一些成熟福利国家在 1980 年至 2001 年间的比较数据,证明这些国家确实出现了不平等趋势。在我们指出“福利国家转变指数”计算的原理后,所得的值将帮助我们理清现有的数据。至此,我们可以看到 OECD 宏观数量改革轨迹的详细脉络。最后,我们将讨论 OECD 在经济独立和财政紧缩的情况下社会政策改革的程度和方向,并给出我们对这种定量分析方法有用性的一些思考。

一、不同时空的福利资本主义类型

“社会权利”数据分析长期以来是划分不同“福利制度”的主要方法。艾斯平-安达森(Esping-Andersen, 1990)最初是基于资格标准,收入补偿比例和享有老年退休金,疾病和失业津贴这三大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条件(轮候日期和/或持续时间)来计算“去商品化”的值。斯克拉格斯(Scruggs, 2006)在坚持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改变了艾斯平-安达森原来的求值方法从而得出了一个“福利慷慨度指数”(welfare generosity index),而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修正了的“去商品化”指数。斯克拉格斯(Scruggs)的比较福利权利数据组(Scruggs, 2005)提供了1970年到2002年间最富裕的民主国家“去商品化”的年度数据。这些数据是福利国家动态比较视角研究不可多得的选择。

资格标准、收入补偿比例和享有福利的其他条件(轮候日期和/或持续时间)的转变,或者说,社会权利的转变,自然成为成熟福利国家改革的重中之重(Cox, 1998)。斯克拉格斯(Scruggs, 2003: 4)强调津贴支付具有“本质”特征。失业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很多失业的风险是“外生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失败而仅仅是源自“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结构性脆弱(structural vulnerability)”。失业不仅(马上)使生活陷入困境,还可能破坏一生的发展机遇。斯克拉格斯(Scruggs, 2003)认为如果缺乏合适的社会保护就会出现一个“劳工的时间短视问题(reduced time horizons of workers)”,因为失业者将被迫为了满足眼前的需要而忽视更长期的未来规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直接从失业金替代率的下降推断出该社会工人承受的后果。这比光看失业津贴的财政数据更为奏效,因为数据会由于不同方案需求的变化而受到影响(Kühner, 2007; Siegel, 2002)。

退休金在艾斯平-安达森(Esping-Andersen, 1990)的《福利资本

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一书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事实上它是所有成熟福利国家最广泛(也是“最贵”)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是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改革现有福利制度“至关重要的”因素。与上述失业津贴的例子相似,再就业或补贴比例的下降以及资格标准之严格都导致了福利提供慷慨度的直接降低和退休金领取者的贫困加剧。疾病保险的变化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 社会权利和去商品化:“福利消解”的个案?

关于斯克拉格斯数据组中各项的改变方向和范围,可以写的还有很多。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对津贴水平和资格标准的变化进行详细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大量对斯克拉格斯数据组的分析。在本文中我们将超越对单一要素的关注,重点考察斯克拉格斯“总体福利慷慨度指标”(*overall welfare generosity indices*) 的动态。

包括艾斯平-安达森(*Esping-Andersen*, 1990) 在内的学者都假定“去商品化特点”和特定的福利国家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几乎不变。斯克拉格斯挑战这个观点,而他的数据也的确展示了问题的另外一面。1970 年到 2001 年的数据或许最有力地说明了福利国家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它们的“去商品化特点”(*Scruggs*, 2003: 32 - 34);即使将考察的时间段缩短到与本文更相关的时间(1980 - 2001),这个结论还是成立的。

至此,我们并不想讨论“福利慷慨度”上升或下降的势头可否被解读为从一种“福利制度”到另一种的“路径打破式”(*path breaking*) 转变,虽然这个问题在近年的文献中已经引起注意(*Hudson et al.*, 2004; *Seeleib-Kaiser & Fleckenstein*, 2006)。各个国家自上世纪 70 年代(甚至 80 年代)以来是否离开了它们特定的社会政策的制订道路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此处难以展开论述。单靠指出本文宏观统计数据的上升或下降也不一定能给出一个有力的解释。

自然,这个局限与上面提到的福利国家对比分析的“因变量问

题”直接相关。将增长率解读为“福利国家转变”的危险并不专属于基于支出的衡量方法。我们对于“去商品化”动态的数量分析方法也遇到了其他文献类似的问题:即以某个正值就判定“福利回弹”或“福利扩张”从本质上说是武断的。不过,从这些统计数据的描述分析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

很多国家都已经历了“福利慷慨度”程度的重大改变。例如疾病津贴、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以“福利慷慨度”的综合衡量方法分析可发现,这些单项类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呈现出不同的转变轨迹(见附录表 1)。较多国家在失业保险上降低了“去商品化”特征,不过这些转变比起疾病保险和老年退休金的转变还略显温和。同时,爱尔兰、挪威、丹麦和意大利在特定的项目上均提高了其慷慨度水平。有趣的是,这些发现与普遍认为的被动失业津贴到主动的工利的转变并不一致。至于老年退休金的成熟化进程无疑说明了慷慨度水平的显著提高(见附录表 1)。但是,在八个提高了慷慨度水平的国家中(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挪威和英国)有七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老年退休金慷慨度的显著下跌。

把三大项目的数据整合起来,总体“福利慷慨度”的趋势向我们暗示了不同福利国家“去商品化”特点的发展。事实很明显,斯克拉格斯(与他一致的是 Esping-Andersen, 1990)并未能解释现代福利国家改革评估中包括的所有相关的社会保障项目,没有将家庭津贴算进去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总体得分体现了上面讨论的三个社会保障计划的总和。

从斯克拉格斯的数据看,瑞士的“福利国家慷慨度”出现了最剧烈的下降。法国是仅有的另外一个出现三大社会保障计划缩减的国家。相比起瑞士疾病保险最大幅度的缩减,从绝对值上看,这些负值转变似乎更为恒常。从总体上看瑞典是第二大缩减国。而丹麦尽管在失业保险和老年退休金上有所提高,但在疾病津贴保险上的减少足以大幅度降低“总体”数据。德国和新西兰在绝对值上降低的幅

度和丹麦类似,不过两国在三大保障项目上的缩减模式并不相同。这里想说明的是,如果把统计数据拆解到项目层级予以考虑,则相似的“总体福利国家慷慨度”值代表着非常不同的改革轨迹。虽然很多文献着墨于“大范围”的消解,18 个代表国家中有 9 个在 1980 至 2001 年间呈现出“福利慷慨度”的上升,有些国家上升的幅度还很大。上述结论已归纳在表 1 中。

(二) “社会分层”的动态

很多关于“福利制度”的学术辩论都关注“去商品化”的概念,相比之下“社会分层”便显得次要。虽然福利国家提供的服务和收入保障无疑是探讨的核心,但是说明福利国家“也是,并且一直都是社会分层制度”同样重要(Esping-Andersen, 1990:55),因为“就算生活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下降,本质上的阶级或地位分化还是存在的”(Esping-Andersen, 1990:57)。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艾斯平-安达森(Esping-Andersen, 1990)的一些“分层指标”重新计算。这些数据是成熟福利国家改革进程分析的有力补充。不同社会保障体系分层的加剧和再分配的减少使得上层和底层的受益人更容易出现社会不平等分化。福利国家的“剩余”特征的增加和“私有化”程度被认为偏离了“社会团结”(solidarity)的原则,原因是其出现意味着个人的就业和供款纪录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艾斯平-安达森(Esping-Andersen, 1990:70-71)提出了一套衡量“社会分层”维度的指标。有趣的是,大多数指标都是基于加总的社会支出数据建立,违反了他计算去商品化值时基于支出的衡量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评估。也有学者发展出了稍有不同的框架,以划分与“社会分层”有关的“福利资本主义类型和维度”(Kohl, 1993)。所使用的数据是这些尝试的综合体现。

对社会福利金,尤其是服务的私有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被认为是“福利国家转变”的主要特点之一(如 Swank, 2001)。不过,在我们观察的国家中,很难说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单一的。

表 1 总福利支出或社会权利以及福利成果指标比较结果

衡量指标	表明了以下国家……		
	消 解	反 弹	扩 张
非标准化社会支出指标	爱尔兰、荷兰	比利时、丹麦、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	奥地利、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瑞士
标准化社会支出指标	新西兰、芬兰、德国、日本、荷兰、瑞典	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西班牙	希腊、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瑞士、美国
福利国家缩小	比利时、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英国、西班牙、瑞典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挪威、瑞士、美国	芬兰、希腊、意大利、日本、葡萄牙
非标准化、净社会支出	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	—	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美国
总体福利国家慷慨度	瑞士、法国、瑞典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美国	加拿大、芬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爱尔兰
私有化	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日本、荷兰、瑞士、英国、美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爱尔兰
剩余	爱尔兰、瑞典、英国、美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	荷兰
完全就业保证	芬兰、爱尔兰、日本、英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希腊、意大利、新西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美国	丹麦、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
收入分配 (90/10 比率)	比利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瑞典	加拿大、丹麦、荷兰、挪威、瑞士	—
失业	德国、希腊、日本、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芬兰、法国、意大利	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	比利时、丹麦、英国、美国、爱尔兰、荷兰、葡萄牙
劳动力市场参与	丹麦、芬兰、瑞典	法国、意大利、英国	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希腊、爱尔兰、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美国
相对贫困	比利时、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英国、奥地利、西班牙	澳大利亚、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美国	加拿大、丹麦、法国

注：“总体福利国家慷慨度”指标的增长率以 5 分制来划分：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 -1.00 的为已经消解；> -0.99 且 < -0.51 为轻微消解；> -0.5 且 < 0.5 的为明显反弹；> 0.51 且 < 0.99 的为轻微扩张；而 > 1.00 的为显著扩张；处于“边界”的国家放在括号中表示。关于各个指标的来源和操作见附录表 1-6。

私人老年退休金和服务的相对支出百分比在某些国家有惊人的上升或下降:OECD 社会支出数据库(简称 SOCX)指出,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英国和美国的强制性或自愿性私人退休金有显著的相对增长。爱尔兰的强制或自愿私人退休金的支出在整体退休金支出中的比例下降,是唯一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 OECD 国家。相比较而言,公共和私人医疗保障方面的相对支出稳定多了。大多数国家提高了私人支出的相对比例,尽管极其有限(除了上面提到的加拿大、荷兰和瑞典)。根据 SOCX 的统计,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在该时期私人医疗支出相对比例显著下降的国家。瑞士医疗保障的私人支出飞速增长,这和前面“去商品化”的结论也是相一致的(OECD, 2004, OECD, 2007;见附录表 2)

福利国家的“剩余”特征,或称之为“低收入群体认定”的重要性,一向是以总公共社会支出中收入补贴或社会援助计划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不过这些统计数据往往很难解读。“低收入群体”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而收入维持和社会援助的社会项目又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决定是否应该包括某个支出类型时,答案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做公共支出衡量的分析时,必须意识到其因果关系。与之前通过控制失业及退休人数以标准化总支出的讨论类似,失业人数的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贫困显然会导致对低收入人群支出的上升(仅仅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相对公民人数在这个情况下增加了)。换一种说法,面对这些群体的公共支出的增加并不一定象征着他们获得政府更多的关注,而不过是因为这些社会项目的需求上升了。双变量相关测试告诉我们,公共支出的变化并不是与失业增加、不平等收入或相对贫困显著相关的,即福利国家这个特定要素的支出动态并不能简单地看成一种功能。

在我们观察国家政府参与“确保全面就业”的指标时社会政策的需求起了作用。类似的是,“积极劳工市场计划”(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ALMP)的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是由项目“扩张”引起的,而可以简单地看作是失业率上升的一种功能性结果。维斯

(Vis, 2007) 建议根据每个国家的失业率来标准化 **ALMP** 的支出水平。我们有两个理由来反对这种标准化程序。第一、失业数据对比和 **ALMP** 支出的动态同样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经验性证据证实这个功能性因素在驱动支出；第二、我们不相信简单的失业率足以控制需求效果，因为 **ALMP** 策略在面临长期失业时大幅度调整的百分比在我们考察的这些国家中有很大的不同。除此之外，使用社会人口统计代理控制的解释值也证明了其他研究者试图“标准化的”的例子是存在问题的 (Kühner, 2007)。

另一个概念分歧也变得显而易见了。包括艾斯平 - 安达森 (Esping-Andersen, 1990) 在内的学者们都将 **ALMP** 支出作为“确保全面就业”的一个指标，比如将相应的社会项目支出的增长解读为“福利扩张”的指标。更近期的研究则有与此不同的见解，比如凯维斯特 (Kvist, 2006) 和维斯 (Vis, 2007)，他们认为 **ALMP** 支出在 **GDP** 中的更高比例可用于衡量一些福利国家的活跃度及其工利特征。从这点看来，**ALMP** 支出的增加暗示了从传统的凯恩斯型福利供给到捷索普 (Jessop, 2002) 称之为后福特主义或熊彼特主义的福利国家的转变。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福利方案的过渡是典型的“福利消解”的形式。

荷兰在 1980 到 2001 年间呈现出最大的 **ALMP** 支出的下降，而该时期它只经历了平均水平的失业增长。荷兰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它大部分的就业增长来自兼职就业，而 **ALMP** 支出增长则当然是与荷兰劳工市场这种发展联系的。其他国家 **ALMP** 支出增长相对较大的国家如德国、丹麦、法国和西班牙都遭受了失业上升；然而，失业上升的数据表明至少从整个时间段来看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压力 (西班牙除外)。当然，这个判断忽略了这些国家结构性失业的水平。列出的国家中至少有三个国家，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结构性的长期的失业是在平均水平以上的 (OECD, 2004b)。

芬兰、爱尔兰、日本和英国的 **ALMP** 支出相对于总体社会预算来说在 1980 年到 2001 年间有显著的下降。我们再次建议对这些数

据要谨慎并且不要过分相信。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失业数据在英国尤其是爱尔兰的大幅度下降,对整体支出的数据有影响。因此,只有芬兰和瑞典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的倒退,因其 **ALMP** 支出的相对下降和该时期失业的显著增长相伴相随(社会政策改变与政策结果互动的重要性,比如失业率,对“福利国家转变”的理解在下一部分将做详细阐述)。

二、不平等趋势和公共部门重组

至此,我们对各个成熟福利国家福利改革进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福利国家如何设法降低公民对就业的依赖性之上。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将关注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成果指标。尽管早有福利国家的分析者将这些指标作为语境变量来看待,意识到它们同样可以作为依存因素来得出重要结论还是最近的事情。对于福利国家发展和重组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来说尤其如此。

比如,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克雷顿和蓬图森(Clayton & Pontusson, 1998),他们的描述性分析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对财政福利的关注“太狭隘”,“福利改革”分析必须能够解释成熟福利国家“日益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和缺乏保障的背景”(Clayton & Pontusson, 1998: 69)。类似的是,科尔比(Korpi, 2003: 591)关注欧洲福利国家失业数据的动态并指出,大规模失业的卷土重来应该被确认为福利消解的一个指标:因为“在西欧,战后的福利国家把完全就业作为一种基本的典型做法,这使失业率上升成为福利国家倒退的一个重要指标”。科尔比(Korpi, 2003: 591)强调了市场不平等的日渐加剧和大规模失业的再次出现剧烈地改变了成熟福利国家及其劳工市场的运作。比如,以全民福利制度著称的斯堪的那维亚福利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保险制度。结果是,即使在这些非常慷慨的国家,越来越庞大的(长期)失业人口和与日俱增的必须纯粹依靠经收入审查派发的社会援助维生的公民人数其实也是密切相

关 (Clayton & Pontusson, 1998)。

把缺乏社会保障的发展包括进来,对我们评估不同国家“福利国家转变”的现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失业福利金慷慨度的下降(根据基于支出或基于社会权利的指标来衡量)本身就是福利消解的例子。如果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出现了失业人口的上升,那么其消解的过程就更为显著。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按照社会不平等的增长和收入贫困来判断社会援助项目的慷慨度。

(一) 不平等、失业和贫困:实证证据

衡量收入分配,通常的做法是拿收入最低的一成人口的收入和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的收入作比较(见 LIS, 2007)。尽管如此,工资不平等的数据仍稍嫌不完整,并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不过,要确定成熟福利国家一个比较普遍的趋势仍是可能的:绝大多数 OECD 国家不同性别间的综合收入不平等在加剧,最广为人知的要数比利时、英国和美国。在收入不平等上,有几个国家只是非常轻微地增长从而或多或少保持了“稳定”(加拿大和瑞士则只是轻微下降),而大多数国家在 1980 年到 2001 年间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接近 10% 的增长 (LIS, 2005; 见附录表 3)。

OECD 中的公民失业动态差别很大。相对其他样本国家来说,奥地利、日本、瑞士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除了丹麦)表现出相对低的失业水平,或许更重要的是,至少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早期,总的来说它们都能最小化失业潮的涌现。90 年代间这些国家的失业数据也有大幅上升,但是仍然保持在 OECD 平均值以下。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丹麦的失业率在 80 年代呈现高增长;除了丹麦,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一直高涨到 2001 年。爱尔兰、荷兰、英国,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了美国,均在 90 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后降低了失业率 (OECD, 2005, 见附录表 4)。

库萨克 (Cusack, 1995) 认为比较就业参与率能更充分地评估一个国家在“完全就业”这个目标上的表现。提高就业参与已成为所

有 OECD 政府(不仅仅是那些走“第三条道路”的)宣称的目标之一。此外,在将整个劳动年龄人口整合进劳工市场方面,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见附录表 5)。一般认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除了芬兰)和瑞士做得尤为成功,比率接近甚至超过了 80%。不过,尤其自 90 年代以来,丹麦、芬兰和瑞典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滑落。事实上,仅有这三个国家就劳动年龄人口百分比来看呈现出了就业的负增长。不管失业数据上的形形色色的表现,英语(或者说自由主义)国家保持了相对较高比率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甚至在后石油危机的几十年里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增长。在此,新西兰值得一提,因为它和荷兰以及瑞士一样经历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西欧(社团主义)在很多方面位于中游。就劳动年龄人口百分比而言的总体就业远低于社会民主和自由主义国家,但仍然高于南欧国家(包括爱尔兰)。尽管后面的这组国家似乎已在飞快地追赶上来,但就劳动人口百分比而言的劳动力增长率来看,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展得还是很慢。

最后,收入贫困增长的发生率经常被作为另一个例子引用,以说明缺乏保障的加剧和社会连带受到威胁。显然,如何衡量“贫困”是长久以来的传统争议,而最近,这个讨论又因为对“福祉”的兴趣而升温。我们用其收入低于中位家庭收入的 40% 家庭的人口百分比来衡量贫困,这样做纯粹是因为数据的可用性(也部分因为定量分析的研究往往选择同样的实际基本原理)。所观察的这些国家大多数出现了相对收入贫困的加剧。然而,并不是所有观察的 OECD 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国家都设法维持了它们的贫困程度(虽然各自的程度很不一样),或者甚至显著降低。芬兰和瑞典的贫困程度下降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加拿大和法国在这方面则做得非常成功(LIS,2005;见附录表 6)。

(二) 走向分裂的社会?

可以看到,尤其到了 90 年代中期,很多 OECD 国家都经历了失

业、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一些国家成功地扭转了这些不平等趋势,但只有极少数国家可以真正回复到 80 年代早期的收入分配和相对贫困程度。所观察的国家有很多都设法提高了总体就业水平,但也有几个国家的失业百分比大幅上升。

我们同意克雷顿和蓬图森(Clayton & Pontusson, 1998)还有科尔比(Korpi, 2003)的看法,对上述趋势的忽视致使福利改革的比较研究显得太“狭隘”;我们提倡“拓宽”分析维度,遵循休伯和史蒂文斯(Huber & Stephens, 2001)的例子,将政策成果衡量作为重要的语境和依存因子结合到定量和定性分析中。只看基于支出和社会权利的指标有时候并不足以充分地说明“福利国家转变”的现实和某些政策改革的重要性。

自然,在用数学语言分离增量转变和全面转变时,政策成果衡量与社会支出和社会权利指标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处理收入分配比率、基尼系数或贫困程度时这些问题还会放大。一个基尼系数上升了 1.2 的国家(从 1980 年到 2001 年),它的“(不)平等特征”和一个同期内基尼系数上升了 2.0 的国家的“(不)平等特征”相比究竟有什么分别?这一部分的研究方法将撇开常见的理论基础,进行纯粹的实证分析。

上述指标的多维度特征给比较福利国家文献中确定的“因变量问题”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在收入不平等和/或相对贫困保持稳定,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例如瑞士),这是否足以强调一个国家大规模失业的再现,从而证明“福利消解”的出现?对于一个在抑制公民失业率和提高总体就业率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国家,我们该如何评价其总体公共部门就业率的下降(例如澳大利亚)?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成果,在六个方面中有四个的情况变得更糟,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国家出现了大范围的“福利消解”,还是说我们应该选择其中三个作为分界点呢?实证分析的答案很可能是这些问题并不存在答案。不过,倒是可以将本文中各个国家不同指标中的轨迹结合为一个指数值。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对此建议一种可能的方法。

（三）全貌：“福利国家转变”的宏观数据视角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试图倾向于文献中认为的福利国家保持高度弹性的说法。纵观全局,除非考虑不同类型的贫穷和社会不平等的衡量的动态,否则不论是基于支出、社会权利或者福利成果的衡量,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表现出大范围的“福利消解”。这在表1中作了描述,表1结合了前面的讨论得出的结论,从而囊括了库勒(Kühner,2007)谈到的几种基于支出的衡量。

在我们的指标中,我们也强调了国家间的差异。所以,各项基于支出的指标在对一系列国家的衡量中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到,该时期内“去商品化”和“分层”的动态在样本国家中并没有相互关联。至于各个“福利成果”衡量,我们也没有找到明显的联系。

我们可以接着详述指标中体现出来的赫然相反的数据。比如,如果我们比较基于支出的衡量方法和“去商品化”的指数值,就会发现像爱尔兰和瑞士等几个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统计显示,英国提高了它的“非标准化”和“标准化”的社会支出(以及“去商品化”值);同时,它的“社会分层”水平在上升,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稍有下降,相对贫困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所上升。这类事实可谓不胜枚举。

我们刚刚讨论过,不同的指标之间的迥异,除了一些支出衡量以外,并不一定是方法论上的问题,反之,它们指出了不同国家间改革轨迹的不同。我们也指出了这给老生常谈的“福利国家转变”的现实带来了更深远的结论。转变的现实看上去并不如有时候文献表明的那样直截了当,尤其是当其研究的方法只是基于一个单一的指标时。

自然,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出现了,是否样本国家总体而言比其他国家经历了更大程度的“转变”呢?这需要更多的探讨。最简单的方法很可能是测试上述的指标来计算一个简单的附加指数。遵循我们上述的方法,如果这个值表示了特定国家的“消解”,我们给每一个表1中的指标一个值“-1”;如果一个国家的转变呈现出“消

解”模式,我们记为“0”;指标显示福利供给有所“扩张”的话,我们记为“+1”。对处于边界的情况,之前用括号中的值做了标记,这里我们记为“-0.5”或者“+0.5”。

将所有的指标值叠加,我们便可以计算出一个总和指数来表示我们样本中每个国家转变的方向和程度。由于不能获得每个指标中的每个国家的数据,我们除以加总到指数上的分值的数目^①。对于这些指标确定的问题,基于支出的衡量解决了一半。那些呈负标记的,总体来说,在该时期内呈现“福利消解”。与之相反,正标记的国家平均看来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福利减退,而是设法扩大了福利供给。每个基于支出、社会权利和福利成果指标的指数值以及每个国家的总指数值见表2。

表2 “福利国家转变”指数值

国家	支出	社会权利	成果	总计	总计排名
葡萄牙	100.0	0.0	100.0	300.0	1.0
澳大利亚	75.0	0.0	12.5	100.0	2.0
希腊	66.0	0.0	0.0	66.0	3.0
西班牙	16.0	25.0	0.0	66.0	4.0
法国	33.0	12.5	0.0	58.0	5.0
加拿大	0.0	-12.5	37.5	50.0	6.0
丹麦	-25.0	25.0	12.5	50.0	7.0
荷兰	-75.0	25.0	25.0	25.0	8.0
意大利	62.5	25.0	-50.0	12.5	9.0
德国	25.0	25.0	-50.0	-25.0	10.0
挪威	-25.0	0.0	0.0	-25.0	11.0
瑞士	66.0	-50.0	0.0	-34.0	12.0
奥地利	-12.5	0.0	-12.5	-37.5	13.0
爱尔兰	-62.5	0.0	12.5	-37.5	14.0
日本	33.0	-37.5	0.0	-42.0	15.0
芬兰	-37.5	37.5	-50.0	-62.5	16.0
新西兰	-66.0	0.0	0.0	-66.0	17.0
美国	6.3	-50.0	12.5	-68.8	18.0
比利时	-50.0	-25.0	-25.0	-150.0	19.0
英国	16.0	-62.5	-37.5	-184.0	20.0
瑞典	12.5	-37.5	-62.5	-187.5	21.0

注:指数值已乘以100。

^①数据可用性对希腊、日本、新西兰和葡萄牙尤为重要,对这些国家的衡量必须仔细慎重。

计算出的指数值的跨度很大,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之前的论述,认为成熟福利国家大范围消解的观点看上去是有点言过其实了。自然,有几个国家,平均来说,在该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福利国家减退(瑞典、英国、比利时和美国、新西兰以及芬兰);然而,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要么保持了或多或少的“弹性”,要么甚至“扩张”了总体上的福利供给。并不让人吃惊的是,恰恰是那些有时被认为是“福利落后”的国家在福利供给的“扩张”上最为突出(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很多社团主义国家,在该期间只表现出了相对小的转变(德国、意大利、瑞士)。有趣的是,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rdsen, 1990)的福利国家制度类型并不能充分解释表2中表现出的结果。统计表明,一些自由主义国家(爱尔兰、新西兰和英国)经历了“福利消解”,而澳大利亚的福利国家扩张了。一些社会民主国家(丹麦和荷兰)在该期间对改变保持了高度的弹性。不是所有的社团主义国家都呈现一种稳定的模式,法国有总体的扩张,而芬兰则是最高的负指数值的国家之一。于是,我们“福利国家转变”指数和艾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值是负相关,但这种相关只是微弱的,从统计上看并不显著。

结 论

比较研究的学者们越来越强调“福利国家转变”这个概念的多维性。也有学者通过指出常用的衡量方法上概念性,数据源和操作层面的问题强调了基于支出的衡量存在的缺陷。这篇描述性的论文试图解决这两种批评提出的问题。通过运用一系列福利慷慨度、社会分层和成果衡量,我们得以对80年代到90年代“福利国家转变”的现实有一个较之通常的文献更为全面的了解。

毫无疑问,对“福利国家转变”比较研究的数量和宏观维度,批评者大有人在,对本文也可挑出诸多不足。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也许表现了最近的“现有水平”,但也绝非无懈可击。我们已经在上述的

讨论中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局限。从宏观视角将“消解”、“反弹”和“扩张”的轨迹分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直觉,而非理论推断。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历史视角,我们的结论不能被误读为这些国家新近的政策动向而导致它们在“福利国家转变”的位列有所改变。只有获得更多所有“福利国家转变”特定维度的资料才能使我们了解到最近的社会政策制定。

一些重要的结论并没有改变。我们认为,用劳工市场表现和收入差异的衡量来补充支出和社会权利的衡量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有趣的是,我们的结论和文献中常有的结论并不一致。首先,认为“福利国家黄金时期”后出现广泛的福利解体的观点看上去是言过其实了。的确,一些观察的国家在他们的福利机构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间也遭受了收入不平等加剧、大规模失业的重现和由此产生的相对的收入“贫困”的上升。同时,同样多的国家,不仅仅是那些原先被认作福利落后的国家,在同时期里经历了一些显著的扩张。这与文献中提到的大范围“福利反弹”并不一致。即使第三组国家确实在变化面前表现出显著的弹性,也不能改变这个判断。另外,不同的改革轨迹和艾斯平 - 安达森 (Esping-Andersen, 1990) 的福利国家制度类型也没有很紧密的关联。并非所有保守福利制度都不能改革业已存在的福利安排。在西方世界中,也并非所有社会民主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双重革命时,都选择走上降低慷慨度和减税的道路,更不会是所有自由主义国家都能成功地进一步缩小业已有限的福利安排的范围。

单一指标的研究方法不能够说明“福利国家转变”的多维性。根据标准的和非标准的、毛福利和净福利、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的各项指标得出的不同的改革轨迹并不一定在方法论上有问题(即,并不总是由数据的有效性或可靠性引起);反之,它们可以单纯地反映出不同的改革轨迹和特点。确实,有观点认为本文采用的纯粹关注数据的方法也并不能够得出真正有助于理解(在韦伯式的意义上)不同国家转变的动态和政治的结论。定性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更适

于此类研究。但这并不改变上述定量衡量继续被广泛使用在对比福利国家的文献中,并且发挥很好的作用。我们希望不同定量分析方法的存在可以引发学者们进一步尝试运用各种衡量方法,以解决上述各种衍生问题。不仅如此,通过突显各种方法的局限,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激发学者们在未来更有力地结合各种不同的认识论。

参考文献

Birchfield, V. & Crepaz, M. L. (1998). The Impact of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Collective and Competitive Veto Points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4.

Castles, F. G. (2004). *The Future of the Welfare State: Crisis Myths and Crisis Rea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sen, J. & Siegel, N. A. (2007). *Investigating Welfare State Chang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Clayton, R. & Pontusson, J. (1998).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Revisited. Entitlement Cuts, Public Sector Restructuring, and Inegalitarian Trend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World Politics*, 51.

Cox, H. C. (1998). The Consequences of Welfare Reform: How Conceptions of Social Rights are Changing.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7(1).

Cusack, J. (1995). Politics and Macroeconomics Performance in the OECD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FS I 95 – 31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Berlin.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Ed. (1996).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Sage.

Green-Pedersen, C. (2004).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 within the Study of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Defining the Problem and Looking For Solu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6.

Huber, E. & Stephens, J. D.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dson, J., Hwang, J. & Kühner, S. (2008). Between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nalyzing Third Way Welfare Reform Programmes

in Germany and the UK.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7(2).

Jessop, 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ohl, J. (1993). Der Wohlfahrtsstaat in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Anmerkungen zu Esping- Andersen's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reform*, 39(2).

Korpi, W. (2003). Welfare State Regress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s, Institutions,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Kühner, S. (2007). Country-level Comparisons of Welfare State Change Measures: Another Face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 with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7(1).

Kvist, J. (2006). Measuring the Welfare State. Concepts, Ideal Types and Fuzzy Set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en, J. & Siegel, N. Eds. *Welfare Reform in Advanced Societi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Northampton.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2007). Key Figures. From: <http://www.lisproject.org/keyfigures.htm>. finally accessed on 2007-05-09.

Mishra, R. (1999). *Globalis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Edward Elgar: Cheltenham/Northampton.

OECD (2004).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Paris: OECD.

OECD (2004). *Economic Outlook* (Second Edition). Paris: OECD.

OECD (2004). *Quarterly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Fourth Edition). Paris: OECD.

OECD (2007).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Paris: OECD. From: http://www.oecd.org/document/9/0,2340,en_2825_497118_38141385_1_1_1_1,00.html. finally accessed on 2007-03-21.

Pierson, P. (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World Politics*, 48.

Scruggs, L. (2005). *Comparative Welfare Entitlements Dataset*. From: <http://www.sp.uconn.edu/~scruggs/wp.htm>. finally accessed on 2005-08-24.

Scruggs, L. & Allen, J. (2006). Welfare State Decommmodification in Eighteen OECD Countries: A Replication and Revisio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6(1).

Seeleib-Kaiser, M. & Fleckenstein, T. (2006). Discourse, Learning and Welfare State Change. The Case of German Labour Market Refor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9th SPA Conference, The State of Welfa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8th – 20th July 2006.

Siegel, N. A. (2005). When (Only) Money Matters: The Pros and Cons of Expenditure Analysi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SPAnet annual conference, Fribourg, 22 – 25. September 2005.

Swank, D. (2001).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Social Policy Change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In Pierson, P.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is, B. (2007). States of Welfare or States of Workfare?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16 Capitalist Democracies, 1985 – 2002. *Policy & Politics*, 35 (1).

(责任编辑:何艳玲)

《公共行政评论》网络投稿系统已经启动

《公共行政评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PA)网络投稿系统已经正式启动。欢迎作者登陆 <http://jpa.sysu.edu.cn>, 进入首页“投稿系统”投稿;同时,也可以进入“录用查询”查询录用情况。

作者也可以继续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投稿,邮件地址为:
jpachina@163.com。

附录表 1 18 个 OECD 国家疾病福利金、失业保险和老年退休金的福利慷慨度动态, 1980 - 2001

	疾病福利金			失业保险			老年退休金			总体水平		
	DF	1980	2001	DF	1980	2001	DF	1980	2001	DF	1980	2001
澳大利亚	5.1	5.3	0.2	5.12	5.56	0.44	9.1	8.33	-0.77	19.32	19.19	-0.13
奥地利	9.99	10	0.01	5.98	5.46	-0.52	11.83	13.12	1.29	27.8	28.58	0.78
比利时	9.36	9.59	0.23	10.53	9.94	-0.59	11.38	13.02	1.64	31.27	32.55	1.28
加拿大	4.7	4.99	0.29	6.28	6.69	0.41	10.27	12.73	2.46	21.25	24.41	3.16
丹麦	14.37	10.9	-3.47	9.4	10.55	1.15	13.48	13.71	0.23	37.25	35.16	-2.09
芬兰	7.58	9.49	1.91	5.11	8.41	3.3	14.69	12.71	-1.98	27.38	30.61	3.23
法国	9.26	7.88	-1.38	7.49	6.94	-0.55	13.59	12.08	-1.51	30.34	26.9	-3.44
德国	13.12	12.62	-0.5	8.35	7.56	-0.79	7.59	6.98	-0.61	29.06	27.16	-1.9
希腊	—	—	—	—	—	—	—	—	—	—	—	—
爱尔兰	5.83	8.29	2.46	7.64	10.21	2.57	7.78	9.99	2.21	21.25	28.49	7.24
意大利	6.97	7.31	0.34	2.1	3.98	1.88	8.73	15.51	6.78	17.8	26.8	9
日本	4.98	5.57	0.59	4.32	4.53	0.21	8.11	10.17	2.06	17.41	20.27	2.86
荷兰	11.14	10.67	-0.47	11.43	10.74	-0.69	13.3	14.17	0.87	35.87	35.58	-0.29
新西兰	5.29	4.36	-0.93	5.48	4.58	-0.9	15.46	15.53	0.07	26.23	24.47	-1.76
挪威	13.87	13.87	0	10.68	12.89	2.21	13.9	15.01	1.11	38.45	41.77	3.32
葡萄牙	—	—	—	—	—	—	—	—	—	—	—	—
西班牙	—	—	—	—	—	—	—	—	—	—	—	—
瑞典	15.66	13.58	-2.08	9.69	10.2	0.51	16.97	11.92	-5.05	42.32	35.7	-6.62
瑞士	12.81	2.21	-10.6	10.94	9.84	-1.1	7.45	6.7	-0.75	31.2	18.75	-12.45
英国	4.84	6.45	1.61	6.4	6.58	0.18	7.48	8.54	1.06	18.72	21.57	2.85
美国	0	0	0	7.63	7.52	-0.11	11.69	11.45	-0.24	19.32	18.97	-0.35

注: n.a = 不存在

资料来源: Scruggs (2005)。

附录表 2 21 个 OECD 国家私有化、剩余/认定、确保完全就业和抵御市场力量的保护政策, 1980 - 2001

	私有化				剩余主义/认定				充分就业保障			
	私人养老金及长者服务开支在总养老金及长者服务开支中的百分比				对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开支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积极劳工市场政策公共开支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1980	2001	DF	1980	2001	DF	1980	2001	DF	1980	2001	DF
澳大利亚	0.00	51.01	51.01	19.94	10.09	-9.85	1.10	1.67	0.57	3.06 (1985)	2.48	-0.58
奥地利	5.27	3.99	-1.28	9.97	10.12	0.15	1.18	1.74	0.56	1.13 (1985)	2.02	0.89
比利时	4.69	19.68	15.00	0.00	0.00	0.00	1.08	0.95	-0.13	4.86 (1985)	4.62	-0.24
加拿大	32.51	51.41	18.90	4.19	15.06	10.87	12.84	12.19	-0.65	2.03	2.38	0.35
丹麦	15.55	22.42	6.87	1.33	2.18	0.85	3.04 (1983)	3.59	0.55	1.49	5.19	3.7
芬兰	0.00	32.84	32.84	1.73	3.18	1.45	0.72	1.58	0.86	5.32	3.81	-1.51
法国	1.93	1.33	-0.60	6.64	14.27	7.63	0.38 (1989)	1.30	0.92	2.56 (1985)	4.52	1.96
德国	4.64	6.21	1.57	6.93	10.20	3.27	0.89	1.62	0.73	2.97 (1985)	4.07	1.1
希腊	0.00	4.60	4.60	0.00	3.94	3.94	—	—	—	0.98 (1985)	0.74	-0.24
爱尔兰	17.66	0.00	-17.66	4.46	7.73	3.27	1.07	2.73	1.66	6.63 (1985)	5.10	-1.53
意大利	10.03	10.30	0.27	0.00	1.18	1.18	0.03 (1990)	0.02	-0.01	1.02 (1990)	1.91	0.89
日本	2.53	31.18	28.65	0.00	0.36	0.36	1.66	0.81	-0.85	2.77 (1990)	1.69	-1.08
荷兰	19.35	37.89	18.55	13.15	20.54	7.39	4.80	2.20	-2.6	2.15	7.06	4.91
新西兰	0.00	0.00	0.00	1.30	7.56	6.25	1.11	0.78 (1995)	-0.33	3.37	2.84	-0.53
挪威	8.95	8.25	-0.70	0.00	0.00	0.00	1.86	1.18	-0.68	3.17 (1985)	3.26	0.09
葡萄牙	5.76	2.83	-2.93	0.00	0.00	0.00	0.1	0.88	0.78	2.86 (1986)	2.77	-0.09
西班牙	0.09	0.00	-0.09	3.84	5.30	1.47	0.02	0.33	0.31	1.13	4.25	3.12
瑞典	12.86	17.12	4.25	0.00	0.00	0.00	0.60	1.74	1.14	4.19	4.70	-0.58
瑞士	20.59	41.08	20.49	0.00	16.53	16.53	1.55 (1990)	1.61	0.06	0.47	1.71	0.89
英国	34.97	47.84	12.87	1.44	5.15	3.71	3.55	5.52 (1989)	1.97	3.10	1.60	-1.50
美国	19.81	42.19	22.38	41.56	45.14	3.58	0.38c	1.78c	1.4	1.24	1.02	0.35

注: DF = 一阶差分 2001 减去 1980; a. 私人 = 强制性及自愿性私人支出; b. 收入维持及社会援助项目的总公共支出; c. 社会援助项目的数
据不存在

资料来源: OECD (2004); OECD (2007); EUROSTAT (2005)

附录表3 OECD 国家收入分配(90/10 比率)和基尼系数发展,
1980 - 2000(2001)

	收入分配(90/10 比率)			
	I : 1979 - 1981	II : 1989 - 1991	III : 1999 - 2000	趋势 (III - I)
澳大利亚	3.93 (1981)	4.19 (1989)	4.25 (2001)	↑
奥地利	2.89 (1987)	3.48 (1994)	3.17 (2000)	↑
比利时	2.73 (1985)	2.76 (1992)	3.31 (2000)	↑
加拿大	4.05 (1981)	3.78 (1991)	3.95 (2000)	→
丹麦	3.22 (1987)	2.85 (1992)	—	—
芬兰	2.59 (1987)	2.63 (1991)	2.90 (2000)	↑
法国	3.40 (1981)	3.46 (1989)	3.45 (2000)	→
德国	2.89 (1981)	2.99 (1989)	3.29 (2000)	↑
希腊	—	5.36 (1995)	4.77 (2000)	↓
爱尔兰	4.23 (1987)	4.34 (1994)	4.56 (2000)	↑
意大利	4.05 (1986)	3.76 (1991)	4.48 (2000)	↑
日本	—	—	—	—
荷兰	2.94 (1983)	3.02 (1991)	2.98 (1999)	→
新西兰	—	—	—	—
挪威	2.76 (1979)	2.79 (1991)	2.80 (2000)	→
葡萄牙	—	—	—	—
西班牙	4.37 (1980)	3.96 (1990)	4.78 (2000)	↑
瑞典	2.43 (1981)	2.78 (1992)	2.96 (2000)	↑
瑞士	3.39 (1982)	3.62 (1992)	3.34 (2000)	→
英国	3.53 (1979)	4.67 (1991)	4.59 (1999)	↑
美国	4.67 (1979)	5.65 (1991)	5.45 (2000)	↑

注:所有数据基于家庭水平的、可支配的、均等化的收入;总收入减去强制性社会供款——收入税;对于部分国家有关结果未必完全可比较,数据库可能来自不同的调查;更详尽的描述可参见: <http://www.lisproject.org/keyfigures/methods.htm>;“↑”表示收入贫穷呈上升趋势,“→”表示稳定发展,“↓”表示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 LIS (2005), OECD (2005)

附录表 4 OECD 国家失业(%) ,1970 - 2001

	1970	1980	1990	2001	峰值	增长率(1980 - 2001)
澳大利亚	1.6	6	6.9	6.7	10.9 (1993)	11.67
奥地利	1.4	1.9	4.7	3.6	5.3 (1992)	89.47
比利时	2.1	8.8	6.7	6.7	11.1 (1984)	-23.86
加拿大	5.6	7.5	8.1	7.2	11.9 (1983)	-4.00
丹麦	0.7	6.5	7.7	4.3	10.2 (1993)	-33.85
芬兰	1.9	4.6	3.2	9.1	16.7 (1993)	97.83
法国	2.4	6.2	9	8.7	12.4 (1996)	40.32
德国	0.8	2.9	4.8	7.8	9.9 (1997)	168.97
希腊	4.2	2.8	7	10.4	12.0 (1999)	271.43
爱尔兰	5.8	7.3	13.4	3.9	16.8 (1985)	-46.58
意大利	5.3	7.5	9	9.4	11.8 (1998)	25.33
日本	1.1	2	2.1	5	5.0 (2001)	150.00
荷兰	0.9	6	6.2	2.4	9.7 (1983)	-60.00
新西兰	0.2	2.2	7.8	5.3	10.3 (91/92)	140.91
挪威	1.6	1.6	5.3	3.6	6.1 (1993)	125.00
葡萄牙	2.5	7.7	4.8	4.1	7.7 (1980)	-46.75
西班牙	2.4	11.1	16.3	10.6	24.1 (1994)	-4.50
瑞典	1.5	2	1.7	4.9	9.9 (1997)	145.00
瑞士	n. a.	0.2	0.5	2.5	4.2 (1997)	1150.00
英国	3.1	6.4	7.1	5	11.6 (1986)	-21.88
美国	4.8	7	5.6	4.7	9.7 (1982)	-32.86

资料来源: OECD (2005)

附录表 5 OECD 国家就劳动年龄人口百分比而言的总公民劳动力，
1980 – 2001

	1980	1990	2001	2001 – 1980
澳大利亚	70.50	74.11	75.38	4.88
奥地利	64.56	67.73	71.25	6.69
比利时	63.00	62.62	66.22	3.22
加拿大	71.73	75.38	76.34	4.61
丹麦	80.97	84.09	79.25	- 1.72
芬兰	76.45	77.65	75.27	- 1.18
法国	68.48	66.45	69.32	0.84
德国	68.45	69.54	72.44	3.99
希腊	55.89	59.16	62.62	6.73
爱尔兰	62.32	62.04	69.69	7.37
意大利	60.76	62.74	61.18	0.42
日本	71.62	74.11	78.51	6.89
荷兰	57.71	66.69	74.62	16.91
新西兰	65.64	73.20	76.02	10.38
挪威	75.28	78.00	80.76	5.48
葡萄牙	70.45	75.47	77.22	6.77
西班牙	57.21	59.32	66.75	9.54
瑞典	81.04	82.53	76.42	- 4.62
瑞士	74.41	83.58	86.66	12.25
英国	74.39	76.88	75.30	0.91
美国	72.01	77.04	78.99	6.98

资料来源：OECD (2005)

附录表 6 OECD 国家总人口的相对贫困率,1979/80 – 2000

	相对贫困(贫困线: 中位收入的 40%)			
	I: 1979 – 1981	II: 1989 – 1991	III: 1999 – 2000	趋势 (一阶差分 III – I)
澳大利亚	5.3 (1981)	6.2 (1989)	5.5 (2001)	→ (0.2)
奥地利	2.8 (1987)	4.6 (1994)	3.6 (2000)	↑ (0.8)
比利时	2.0 (1985)	1.9 (1992)	3.7 (2000)	↑ (1.7)
加拿大	7.5 (1981)	6.3 (1991)	6.5 (2000)	↓ (–1.0)
丹麦	4.1 (1987)	3.8 (1992)	2.0 (2001)	↓ (–2.1)
芬兰	2.6 (1987)	2.6 (1991)	2.1 (2000)	↓ (–0.5)
法国	4.7 (1981)	4.8 (1989)	2.8 (2001)	↓ (–1.9)
德国	2.6 (1981)	3.2 (1989)	4.7 (2000)	↑ (2.1)
希腊	—	10.2 (1995)	8.5 (2000)	↓ (–1.7)
爱尔兰	4.4 (1987)	2.6 (1994)	8.4 (2000)	↑ (4.0)
意大利	5.5 (1986)	4.5 (1991)	7.3 (2000)	↑ (1.8)
日本	—	—	—	—
荷兰	2.3 (1983)	3.8 (1991)	4.6 (1999)	↑ (2.3)
新西兰	—	—	—	—
挪威	2.6 (1979)	2.3 (1991)	2.9 (2000)	→ (0.3)
葡萄牙	—	—	—	—
西班牙	6.7 (1980)	5.2 (1990)	7.9 (2000)	↑ (1.2)
瑞典	3.0 (1981)	4.1 (1992)	3.8 (2000)	↑ (0.8)
瑞士	4.2 (1982)	6.7 (1992)	3.9 (2000)	→ (–0.3)
英国	3.7 (1979)	6.7 (1991)	5.8 (1999)	↑ (2.1)
美国	10.0 (1979)	12.1 (1991)	10.8 (2000)	↑ (0.8)

注:所有数字基于家庭水平的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减去强制性社会供款——收入税;对于部分国家有关结果未必完全可比较,数据库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调查;更详尽的描述可参见: <http://www.lisproject.org/keyfigures/methods.htm>; “↑”表示收贫穷呈上升趋势,“→”表示稳定发展,“↓”表示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 LIS (2007)